

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鸣海内，学者多宗之。始先曾祖之学，久晦不章，一钜公起以不见遗书为憾，良由生平绪论散见各书，未及撰集故也。昔顾亭人没，遗书得门人潘耒刊本书编辑委员会编；江陵竹垞，遗书得乡人戴震表之，以闻于朝。矧为今子孙，不令先世荒坠，不肖甚矣。虽虽潜陋，敢不收罗缀辑，以应世之君子。而濒岁客游，不能以书自随，是以纂述久未成。今果稿约五十余卷，百不言矣。族兄伯印以书来云，史馆修儒林、文苑二传，闻为幽隐，命仆以家藏上诸公希采择。念书未成，愧不足以表章，书当因史馆求，今无以上闻，是没祖德也。不得已上以授鹄堂诗集、刻书及笔记稿本三卷，假伯印以致端公。而汪瑟庵侍郎先见之，谓必当入传，惜不在史局，未知秉笔端公以为何如耳？得是下书，始知惜抱先生有请附海峰入文苑传之语，此或别有微意。今足下以为先曾祖校论诸书，今时诸君子多未能见其书，若仅以诗文入传，是以精深之学为辞章掩矣。贵任子率书

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曹湜敬题

本书编辑委员会 编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本书编辑委员会编. —北京:中华书局,2019.2

ISBN 978-7-101-13670-8

I. 近… II. 近… III. 文化史-中国-近代-文集
IV. K25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2755 号

-
- | | |
|------|--|
| 书 名 | 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
| 编 者 | 本书编辑委员会 |
| 责任编辑 | 刘冬雪 |
| 装帧设计 | 周 玉 |
| 封面题签 | 胡云复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9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30 ³ / ₄ 插页 4 字数 400 千字 |
| 印 数 | 1-12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13670-8 |
| 定 价 | 148.00 元 |
-

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

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

编辑委员会

房德邻 郑师渠 王开玺 梁景和 孙燕京
郑大华 郭双林 李 帆 黄兴涛 邱 涛
张昭军



龚书铎教授（1929—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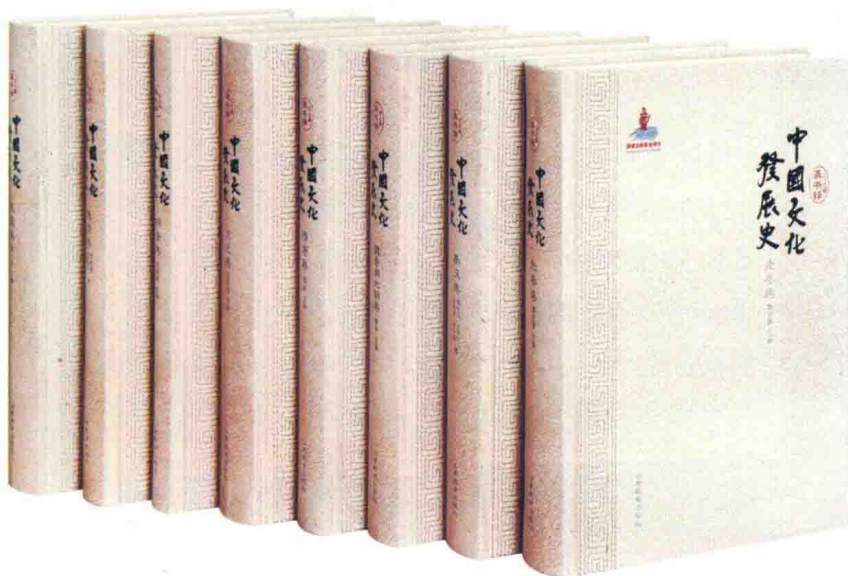
在查阅资料



部分学术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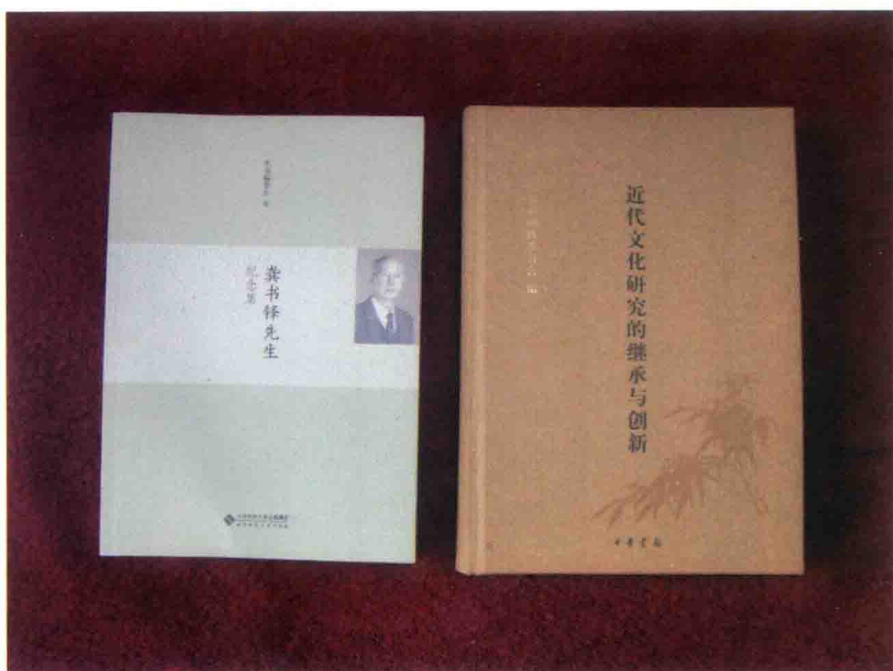
3 卷本《清代理学史》（主编）



8 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主编）



弟子追思会（2012年3月）



纪念文集

序 言

龚书铎先生离开我们业已七年了。然而,师恩难忘。

2009年,先生八秩初度,弟子们鉴于先生一向低调,不喜欢祝寿之类的活动,遂公议在年前举办一个学术座谈会,探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继承与创新,藉以向先生表达贺寿之意。2008年11月,4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龚门弟子,齐集北京师范大学英东学术会堂,召开“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学术座谈会。先生莅会,对众弟子提出了殷切期望。翌年,金冲及、李文海先生赐序的纪念集《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由中华书局出版。2011年底,先生辞世。第二年,在先生去世周年之际,弟子们复集议编辑《龚书铎先生纪念集》,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收集同门的纪念文章,也收集了少数先生生前好友、同事的回忆性文章,是为追思录。十分感念李文海先生,当时已抱病在身,仍勉力为本书作序。之后不久,李先生也离世了。我们也借此深切悼念这位德高望重的学界前辈。光阴荏苒,明年,即2019年,适逢先生诞辰90周年,同时,距上述编辑出版《近代文化研究的继承与创新——龚书铎教授八秩初度纪念》,也恰好是10周年。中国人看重整数,今年7月初,在京同门缘此集议,赓续传统,定于明年初,再次举办学术座谈会,并编辑出版《近代文化研究的拓展与深化——龚书铎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提议在微信公布后,很快得到了京内外同门普遍热烈的响应。是为本书的缘起。

十年的光阴,无论是对学科还是对个人学术的发展来说,都是一种可资观测的重要时间维度。本书共收27位作者的27篇文章,较之前书收30位作者的31篇文章,规模上略有减少。这与分散各地的弟子们多样化的个人时间安排难以统一调剂有关,但本书27位作者中有19位是前书的作者,则说明了作者队伍的

相对稳定性。27篇文章中,着眼于宏观,研究近现代思想文化潮流变动的文章,仍占相当的数量,一些人物研究虽是重在探讨个体的思想取向,但也注意到与普遍性的思潮相联系,作综合的考察。与前相较,探讨具体问题的文章占了较大的比例。还有一些是学术史方面的研究。这反映10年来多数龚门弟子仍活跃在近代思想文化研究领域,其涉及面却是大为展拓了。从上述19位作者选送的文章看,他们个人的研究兴趣与侧重点,也明显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了。

李文海先生在为前书写的序中说:“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以文化史为自己的研究特色和学术强项,这是史学界所公认的。做到这一点,是他们全院师生长期奋斗和共同努力的结果。”这固然是李先生的褒奖,却也反映了客观的实际。对先生教诲的最好回报,就是将先生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从今天看,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学科仍然坚持与发展了龚先生开创的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科方向与特色。本书的出版说明了这一点。十年中,这里主办过两届“近代文化与近代中国”全国性的学术讨论会。从这里走出的一批又一批龚门再传弟子,正充实国家建设的各条战线,不少人已崭露头角,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金冲及与李文海两先生在前书的序中,在高度评价龚先生学术成就的同时,也都高度赞扬了龚先生一生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之难能可贵和令人钦佩。金先生说:“龚书铎同志是我相交近五十年的挚友,彼此无话不谈。多少年来,深知书铎同志治学严谨,勤于思考,从不随波逐流。他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在仔细研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从事研究工作,注重研究的原始性,注重对复杂问题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这是很令人钦佩的。”李先生也说:“书铎同志的学术成就,著作俱在,无需多说。在这里,我只想谈一点。书铎同志是公开申明自己是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并在自己的史学研究中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毋庸讳言,在马克思主义似乎“不行时”的前些年,龚先生与学界李文海等诸位先生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曾被人说成是“极左”与“棍子”,经受了很大的压力。但先生与其他诸位先生一样,坚持初心,不以为意。例如,1997年他就坚持这样写道:“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淡化马克思主义指导等种种说法,均无益于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恰恰相反,只有进一步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通过健康的百家争鸣,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近些年来,上述淡化马克思主义

指导的非理性倾向,正得到纠正。习近平同志不久前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曾强调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现在,柳暗花明,今是昨非,情况自然是不同了。但是,先生不随波逐流,勇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却愈显其光华。故我以为:弟子们继承先生优良的学术传统,其中,根本一点就是:以先生为榜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令人欣慰的是,弟子中绝大多数人是这样做的。看看这两本文集的学术取向,就不难明白这一点。事实上,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学科也始终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研究生的培养,包括学位论文的写作指导与答辩上,旗帜鲜明地坚持这一点,已成为了好的传统,可以告慰于先生。

学术与学科的发展,除了需要“潜心求真知,沥血育英才”之外,还有赖于学者间彼此的团结互助与友谊之滋养。章开沅先生在怀念龚先生的文中,道及新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创立与发展时说:“作为学科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我深深感到真诚深厚的学术友谊的可靠,而精诚团结与相互支持乃是促进学科发展的重要保证。”李文海先生的两篇序言,都用了相当的篇幅回忆自己与龚先生等学界同行历久弥坚的友谊。尤其是写后一篇序时,抱病在身,往事如歌,感怀尤深。他追忆为了让手术后的龚先生舒缓心情和让主持国家清史工程的戴逸先生减少压力,自己策划组织了还包括金冲及、胡绳武等共 11 位先生在内的一次圆明园小聚:饮茶、闲聊与赏荷。今天读先生这篇序文,其情其景,仍令人神往与感动。李先生说,大家有机会碰到一起聊聊天,“说话的时候,想什么就说什么,怎样想就怎样说,不必装腔作势,拐弯抹角,讲究分寸,注意方法,相互之间无所戒备,套一句老话,就是可以敞开心扉,直抒胸臆”。彼此意见有相同的,也有分歧和争论,“但争完后一如既往,并不心存芥蒂。除此之外,似乎再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了。总之一句话,我们的交往,实在简单得像一杯白开水一样”。老一辈学者间的此种交谊佳话,在当下的学界,成了稀缺品,似乎见不到了。功利主义弥漫学界,与团体和个人的利益紧密挂钩的各类评优、评奖、评头衔,不仅让原先的“兄弟院校”在今天都变成了公开的竞争对手,也令学者间原本“淡如水”的交谊多变了味。“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同行相争、同门相残的事屡见不鲜,让人唏嘘不已。为学之道离不开师友之道。上述章开沅先生说学术友谊与精诚团结是促进学科发展的保证,他所说的学科是指中国整个的近现代史学界,兹事体

大;我只想下一转语:促进龚先生开创的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学科的进一步繁荣发展,海内外同门弟子的学术友谊与相互支持,是不可或缺的。

郑师渠 2018 年 10 月 17 日

目 录

近代文化三题/郑师渠	1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梁景和	16
文化史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张昭军	34
情感、思想与运动: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检视/黄兴涛	54
近代中国的种族话语与“双重中心”观/谢 维	71
求真与致用的两全和两难	
——以顾颉刚、傅斯年等民国史家的选择为例/李 帆	90
论杨松对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民族理论的历史贡献/郑大华	120
沉默也是一种言说	
——论梁启超笔下的严复/郭双林	138
先生、总理与国父	
——孙中山尊称的历史考察/马克锋	158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与改良派关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的争论	
——以《民报》与《新民丛报》的争论为中心/周福振	181
《解放》与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张卫波	191
论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国风俗观/王海鹏	205
清末四川庙产兴学及由此产生的僧俗纠纷/徐 跃	215
“鬼话”东来:“红毛番话”类早期英语词汇书考析/邱志红	238
论民国中华书局经营的“陆费风格”/周其厚	251
唐庆增对民国时期大学经济学教育的关注和评论/张登德	263
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群体的南下潮流/王建伟	277
清华简注释之商榷/房德邻	296

不分门户,非为调人:晚清汉宋学关系抉微/程尔奇	318
龚自珍依恋母爱与追寻童心的文化意蕴/曹志敏	343
试论劳乃宣的“以礼入法”思想/张立胜	356
辛酉政变前后两道谕旨之考论/王开玺	364
关于甲午陆战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邝 涛	378
名实之境:“义赈”名称源起及其实践内容之演变/朱 浒	393
面子与法理:中英开平矿权纠纷及赴英诉讼/王天根	414
趋新少壮派与政治急进主义	
——清末改革中激进亲贵的政治心态/孙燕京	436
九一八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焦润明	466

近代文化三题

郑师渠

一

几年前由瞿林东教授主编的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一书,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提出了中国历史文化认同的重大问题,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书的绪言指出,此种历史文化认同,可以概括为“治统”与“道统”:前者“主要指政治统治的继承性”,即“继承了炎黄以来的政治统治”,后者“主要指思想传承的连续性”,即“周公、孔子以来的思想传统”。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列强入侵,“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优良传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就是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新格局的体认。^① 这些重要观点都给人以启迪。

在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我在高度评价该书出版的同时,也提出将中国古代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概括为“治统”与“道统”两方面,不失卓见,也易于理解;但是,在近代,却事有不同:随着清王朝倾覆与中华民国的建立,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走到了尽头,中国社会历史开始了民主共和的新时代,即原有的“治统”,归于终结。而随着西学东渐,尤其是五四后科学与民主思潮的勃兴,诸子学蔚为大观,孔子与儒学走下神坛,古代的“道统”,也名实俱亡。若由是以观,则近代的中国历史文化认同似乎是削弱了,而非加强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此一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显然值得作进一步探讨。当时在座的许多人表示赞

① 瞿林东主编:《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第1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1页。

成,刘家和先生说:“这个问题就请你来回答。”在当时,我也提不出答案来。不过,此后我时常会想起这个问题,现在仅是提出一种假说而已。

尽管早期儒家学说就强调自身传承的脉络,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也早成统治阶级的护符,且最早将“道”与“统”合在一起讲“道统”二字的是宋代的朱熹;但是,千百年来众所公认,“道统”概念毕竟是由唐代的韩愈在《原道》一文中首先提出的。而提出“治统”的概念以与“道统”并列为二,则是韩愈以后的事。韩愈在《原道》中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韩愈揭出“道统”说,除了有为儒学梳理学派统绪和为了排佛,与其“法统”说抗衡外,最重要的还在于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治统)立论,而成其“道统”。故他特别强调:“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①这里彰显的是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主义的社会伦理学说。这与儒家经典《中庸》所说的尧舜文武之道,在内涵与境界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中庸》有言:“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特载,无不覆幬。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②是言虽重在颂扬孔子思想之博大精深,但它同时也指明了孔子儒家所继承光大的尧舜文武之道,追求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包容天地博大而和谐的境界,这里并无后世所谓的“治统”、“道统”之分,其内涵也绝非二者所能涵盖。其后有了以“治统”与“道统”并列,后者的内涵更进一步窄化了。换言之,早年儒家所“祖述”与“宪章”的尧舜文武之道,归根结底,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根本传统,它可以涵盖后人所说的“治统”及与之相对待的“道统”在内,却不容等量齐观。如果我们注意到先秦、秦汉之际的儒家十分强调以文化高低辨夷夏的夷夏观,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因之,指出在中国古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中,逐鹿中原的各类政权

① 刘真伦、岳珍校注:《韩愈文集汇校笺注·原道》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46页。

② 《礼记·中庸》。

都会从“治统”、“道统”两方面,亟力宣扬自身的正统性即合法性,是必要的;但还需要进一步指出:在事实上,中国历史文化的特质在于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文化才是民族认同更为本质的规定。上述《中庸》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韩愈所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都是将政治与文化融为一体的表述。清顺治八年(1651),顺治皇帝在祭告黄帝文中这样说:“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①所谓“继道统而新治统”,无异于是说,“道统”当继,而“治统”则不免适时更新。这固然是为新立的清王朝说项,但它毕竟也透露了“治统”即政治形态有别于“道统”(文化),后者是更具本质性的历史信息。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对中国历史文化有精深的观察,他很早也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说,较之西方,“中国则正相反,政府在概念上始终是同整个文化相关联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几乎已经溶合在一起”。“对于任何奉行孔孟之道的君王来说,不管 he 自己是汉人还是异族”,“就能证明他们的正统性。只要他们这样做,他们就没有变更中国的政治制度,就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②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由于近代中国时移势易,它在被迫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列强环伺,岌岌可危,传统的“治统”、“道统”认知,对于国人来说,已失去了合法性与说服力。故我们对于近代中国问题的解释,只有从中国原本的文化特质入手,才能摆脱上述的困窘,而呈豁然开朗的新境界。

事实上,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亟,志士仁人探寻救国真理,前仆后继,实已逐渐超越乃至全然摒弃了“治统”、“道统”传统的概念、范畴。他们对传播与仿效西方近代民主的政治形态,不以为忤;但对于中国文化(不是道统)的认同问题,却视若命脉所在,是非曲直,在所必争,以至于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争,绵延不绝。鸦片战争以降,魏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并不影响他在《海国图志》中对美国的议会政治表示欣赏;康有为主张“保国、保种、保教”,也不影响他借助今文经学“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倡言将西方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引入中国,以变革传统的君主专制;立宪派与革命派关于立宪还是共和的著

① 沈青峰:雍正《陕西通志》卷85《艺文一·祭告桥陵文》,雍正刊本。

②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4版),张理京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第93、94页。